

MEDIA ECOLOGY SERIES
Media

口语文化 与书面文化

语词的技术化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美〕沃尔特·翁 (Walter J. Ong) 著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edia

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MEDIA ECOLOGY SERIES

口语文化 与书面文化

语词的技术化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美〕沃尔特·翁 (Walter J. Ong) 著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19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美)翁(Ong, Walter, J.)著;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ISBN 978-7-301-14162-5

I. 口… II. ①翁…②何… III. ①文化语言学②传播媒介-环境学
IV. H0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998 号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by Walter J. Ong

Copyright © 1982, 2002 Walter J. Ong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书 名: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

著作责任者:〔美〕沃尔特·翁(Walter J. Ong) 著 何道宽 译

责任编辑:仪玫兰 周丽锦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162-5/G·243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24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总 序

自 20 世纪中期传播学大发展以来,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新媒介、新媒体、新传播形式迅猛发展、快速更新的推动之下,传播学大有发展成为显学的势头。

长期以来,国内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所谓经验学派是以实证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效果研究为焦点、服务体制为导向的美国主流学派。所谓批判学派则以德国法兰克福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批评以及欧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

新千年以来,各国传播学界拓宽视野,开始瞩目以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代表的第三学派。

20 世纪末,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分梳,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对国内学界和读者并不陌生,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除麦克卢汉之外,哈罗德·伊尼斯、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詹姆斯·凯利等人的代表作都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研究他们的文章也日渐丰富。

然而毋庸讳言,国内学界对这个学派的阵容、思想和成就的了解还不深刻,把以上代表人物放进媒介环境学派的视野中研究十分

必要。

把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的鼓吹者是莫大的误读,把 media ecology 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我们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理由是:(1)从这个学派使用 ecology 的意义来看,ecology 是亚里士多德原本使用的“家居环境”,并不能和今天的“生态”画等号;(2)media ecology 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使人注意媒介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定名使人重视该学派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关怀,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潮;(3)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关注的焦点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界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和北美的 media ecology 不是一回事。

媒介环境学的显著特点是:(1)具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跨度大;(2)主张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媒介论,关注重点是媒介而不是狭隘的媒体;(3)重视媒介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4)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媒介环境学从 20 世纪初开始孕育,走过了三代人的历程。

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等。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阿尔弗雷德·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沃尔特·翁(Walter Ong)、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和唐纳德·F. 特沃尔(Donald F. Theall)。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约书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

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和中华文明的和谐思想颇为吻合。它关注的首先是宏观的媒介环境,而不是眼前的那一点点媒体的运行规律,它有助于我们拓宽历史、哲学和人文研究的视阈。

何道宽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 年 6 月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译者前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范畴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民间知识、手工技艺等一切无形文化遗产。这为无形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存,为弘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一 千古之谜

保护的前提是重视,理解的前提是研究。即以史诗为例,有多少遗存正待我们去搜集、整理、记录、研究啊!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百多年来,卓有成效的研究者提出并试图回答“荷马问题”:荷马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如果有一位名叫荷马的行吟诗人,他是不是盲人?他如何能够创作、记住并吟诵数以万行计的荷马史诗?

荷马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9—8世纪,那时还没有希腊字母表,也就是没有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荷马去世两百年后,即公元前700—650年,荷马史诗才被写定并以书面形式流传于后世。

荷马那时的行吟诗人没有文字依傍,其中有些还是像他那样的盲人;他们是什么天才,居然能够“编织”数万行的巨型史诗?即使编织出来了,他们又怎么可能记住这么长的史诗,怎么能够几天几夜一口气唱完?既然不是“文人”,他们又如何能“编织”出韵律整齐、生动感人、语言优美的史诗?他们依靠天然的诗才还是依靠“死记硬背”?

他们吟唱时是否“神灵附体”或“神经错乱”？荷马史诗被写定后就已“死亡”，不再有人传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抑或好坏皆有？

这是千百年间难以求解的问题。但近百年来，峰回路转，关于荷马史诗的这些谜团的谜底逐渐被揭开。

二 揭开谜底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巅峰之一，也是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中国的史诗极为丰富，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史诗仍然活跃在今人的口头传统之中，许多在世的吟诵诗人仍然能够演唱这些史诗。

在当今世界活跃的史诗当然不限于中国，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均有这样的史诗传唱，但没有可与中国的三大史诗匹敌者。

这三大史诗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均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列。《江格尔》长达10万行，《玛纳斯》20余万行，《格萨尔王传》100多万行。以长度而言，《格萨尔王传》超过了世界五大著名史诗（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

近百年来，通过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三大史诗也逐渐掀起了神秘的面纱。

古今各地的史诗演唱人多半是文盲。如今活跃在我国几个少数民族中的史诗吟唱人多半也是文盲，但他们又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圣人”。《玛纳斯》、《江格尔》和《格萨尔王传》的演唱者分别被称为“玛纳斯奇”、“江格尔奇”和“仲堪”。他们能够如痴如醉地演唱几天几夜，民族的源流、神话、传说活跃在他们的口头上，民族的身份认同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学习、记忆、“编织”、表演、传授史诗的实践，反过来证实了学者们破译的史诗密码。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Ong, 1912—2003)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彻底破解了荷马史诗和口语文化的千古之谜。

该书梳理、归纳了一百多年来史诗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理论(polarities of orality and literacy)以及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和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这两种概念，从而细化了人类文化从口语文化、手稿文化、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的文化史分期，研究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在各个时代的此消彼长，为我们研究和保护当代活着的史诗、口语文化和无形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学者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一本

经典著作。

以下分几节阐释和发挥沃尔特·翁及其《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成就。

三 百年成就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介绍了许多著名的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口头传统学者。他们研究古今史诗和口语文化。他们杰出的贡献不在于文献研究，而在于田野调查。他们记录并分析活着的史诗、巫术、成丁礼、“原始”思维即口语文化。

本书重点介绍的口语文化学者有八位：美国古典学者米尔曼·帕利和亚当·帕利父子、帕利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苏联心理学家卢利亚、美国古典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克·谷迪、美国口头传统学者戴维·拜努姆和约翰·弗利。

本书介绍的古典学者还有皮博蒂、吉帕斯基、勒努和卢特里奇，他们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伯克莱·皮博蒂考察古老的印欧语系传统和稍后希腊吟诵诗歌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帕利-洛德理论”；保罗·吉帕斯基研究《吠陀经》，但那是在“帕利-洛德理论”之前，所以未能破译密码；路易·勒努在“帕利-洛德理论”问世之后研究《吠陀经》，但他忽略了这一理论，仍然倾向于认为吟诵《吠陀经》的史诗诗人一字不变地死记硬背；埃里克·卢特里奇研究日本中世纪英雄史诗《平家物语》。可惜这几位学者都没有达到“帕利-洛德理论”的水平。

本书介绍的口头传统学者和其贡献包括：杰弗里·奥普兰，研究南非口语民族科萨人；约尔·谢尔彻，研究巴拿马库里亚人的成年礼；约翰·威廉·约翰逊，研究索马里的口头诗人。

本书提及的其他著名学者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始祖斐迪南·德·索绪尔，英国语音学先驱亨利·斯威特，英国古典学者亨利·切特尔，美国语言学家埃纳尔·霍根、华莱士·切夫和黛博拉·坦能等。

现在我们将本书重点介绍的八位杰出的学者分别做一点介绍。

米尔曼·帕利曾经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执教。他作出了惊人的发现，推翻了几千年来的陈见：原来长篇的史诗不用靠死记硬背。行吟诗人“编织”史诗时，他们有全套的预制材料去“拼装”铿锵悦耳的诗行，去“组装”大段大段的诗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费劲。他们得心应手的预制件有套语、名号、程式、主题、场景，而且有些预制件还是可以“自由”伸缩的词语，它们能够灵活变化并嵌入有固定音节、音步和韵律的诗行。米尔曼·帕利从研究文献入手，然后用实地考察验证。他率先把“死”的史诗（荷马史诗）和活的史诗（口头传统）结合起来研究。在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吟唱诗人“编织”、“拼装”和“组装”史诗的特点，

然后到南斯拉夫地区去做田野调查,证明活的史诗也依靠“荷马式套语”。

他的儿子亚当·帕利子承父业,研究荷马史诗和古今口语文化,编辑其父的遗著《荷马史诗的诞生》,成就卓著。

米尔曼·帕利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青出于蓝,弘扬他的理论,和他一道成为史诗研究的双璧。他们的理论叫做“帕利-洛德理论”,这个理论成为“荷马问题”和史诗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洛德长期深入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史诗吟诵人里去做田野调查,录制了大量的磁带,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实地考察的成果之一是《故事歌手》,这本书写作手法细腻、令人信服。

卢利亚是苏联心理学家、神经心理学家和神经语言学家,著作宏富。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联的乌兹别克地区和吉尔吉斯地区研究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遗存,着重研究口语文化对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的影响,成绩斐然。受访者多半是文盲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访谈往往在茶馆等环境中进行,气氛轻松,真实可靠;问卷设计合理、科学,结论说服力强。《认知发展的文化社会基础》是他的田野调查的成果之一。

埃里克·哈弗洛克是美国古典学家,与马歇尔·麦克卢汉齐名,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研究口语文化方面卓有建树,其代表作《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希腊政治的自由秉性》和《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充分展示了他全方位研究古希腊文化的累累硕果。

杰克·谷迪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曾在非洲和波斯尼亚做过大量田野调查,研究口语文化,他的代表作《野蛮人思维的驯化》和《传统社会里的书面文化》仍然是价值连城的文献。

戴维·拜努姆是美国口头传统学者,提出口语文化里的一些基要成分和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代表作有《林中神灵》和《儿童遗产的拓展研究:1856年以来的哈佛口语文化研究》。他的研究跨越古今世界各地,以古代的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以及现代的南斯拉夫和中非等地区为核心。他发现,口头叙事多半围绕一种基要虚构成分(elemental fiction)展开,他把这种基要成分命名为“二三”模式(the Two Three pattern),即两个“三要素”模式,这是从口头叙事及相关的文字图像里发现的模式。具体地说,这个叙事模式以两个“三要素”展开:“分离、礼物和难以预料的危险等观念”围绕一棵树(绿树)展开,“统一、报偿和互惠等观念”围绕另一棵树(枯树、木头)展开。这个叙事模式有别于图形—文字的叙事结构。

戴维·拜努姆还在帕利口头套语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把史诗套语分为两类:“套语式成分”(formulaic elements)和一成不变地重复的“严格的套语式语汇”(strictly formulary phrases)。这是因为帕利提出的“基本概念”(essential ideas)过

分简单,他认为这些概念并不像帕利定义的那样简要,并不像一般公式那样言简意赅,不像史诗风格那样程式化,也不如大多数公式所指的那样平庸陈腐。

约翰·弗利是当代美国最活跃的古典学家,在密苏里大学创办“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创办并主持《口头传统杂志》,主持“洛德口头传统研究丛书”以及“表演和文本的表达丛书”,著有《口头诗学:历史与神话》、《传统口头史诗》、《荷马的传统艺术》、《故事演唱人》、《口头传统走进课堂》、《如何解读口传诗歌》等。他与中国学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学术联系。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神话、史诗、口头传统、民间文学和无形文化遗产,和各国学者展开交流,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我们希望,《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国内的史诗研究和口头传统研究。

四 本书评价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论口语文化里的思想及其言语表达;第二部分(第四至六章)论书面文化里的思想及其表达以及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第三部分(第七章)把作者的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两极性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这一章审视和批评现当代十来种西方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文本主义、叙事学、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互文性。

本书创新良多,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提出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2)提出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和反差;(3)提出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

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是:

(1) 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口语社会里的人往往将输入的信息条目相加,而不是把它们组织成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酷似儿童讲故事的倾向:“然后……然后……然后……”,只罗列而不加解释。相反,读写社会里的人往往把上下位关系引进话语。

(2) 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文化用大量固化的套语把重要的信息聚合在一起,比如“美丽的公主”、“勇敢的武士”、“油滑的威利·克林顿”之类的陈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之类的格言警句。

(3) 冗余的或“丰裕”的。吟诵、交谈、讲故事的时候,口语文化里的人不得不经常重复,以便理清自己的思绪并帮助听话人理解和记忆。

(4) 保守的或传统的。重复的故事和格言警句、反复的吟诵和宗教仪式赋予

历史和传统巨大的力量。

(5) 贴近人生世界的。在口语社会里,技能和传统的传承无文字依傍,只能靠师徒生受,靠演示和口授的办法传承。

(6) 带有对抗色彩的。部落的决策以面对面的方式做出,意见分歧常常导致口舌之战和智谋之战,这是口语社会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恶语伤人的表现有戏弄、嘲讽、取笑、叫阵、谩骂等等。和恶语伤人相对的是慷慨的赞扬,赞扬也是一种竞赛和对抗。

(7) 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听众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参与。这种召唤一回应模式形成固有的仪式:浅唱低吟、高歌唱和、呐喊助威、鼓掌欢呼,人们常常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

(8) 衡稳状态的。口语社会的语汇和意义比较稳定,借以保障社群的平衡或稳定。因为没有词典固化语词的定义,没有书本温习历史,口头用语就必须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但用语的调整多半是微调。

(9) 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语社会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景。人们一般不会用抽象的词汇和概念,而是用具体的物体名称。比如,人们一般不会用“圆形”、“方形”等抽象的词汇来表示形状,而是用具象的物体来给形状命名,如“盘子”、“门”。

在人类学、神话学、史诗学、古典学、媒介理论等学术圈子里,人们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反差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在媒介环境学派的圈子里,最著名的学者——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埃里克·哈弗洛克、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保罗·莱文森无不在这个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典型主张是一样的:前文字的口语文化在特定的意识框架里运作,书面文化的到来使古人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的变革,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得到复活。翁呼应“帕利-洛德理论”,认为口语文化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是比较少的,吟唱诗人不可能记录和记住复杂和抽象的东西,只能够依靠大量的套语、程式和预制构件来“编织”巨型的史诗。

沃尔特·翁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区别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

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文字产生之前或文字使用之前的社会文化,包括所谓古今“蛮族”的文化。在这个创新术语出现之前,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初民社会的学科使用了一些负面的或歧视性的字眼,比如“原始人”、“野蛮人”、“蛮族”、“落后”、“低等”,甚至在伟大学者的伟大著作里都留下了时代局限的痕迹,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弗兰兹·博厄斯的《原始人的思维》、杰克·谷迪的《野蛮人思维的驯化》。此外,各学科还普遍使用一些貌似中性的术语,比如“前逻辑”、“前文字”、“无文字”等。翁认为,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用口语文化一书面文化的两

极性来说明,都可以用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转变来解释。

我们用他的定义来说明口语文化:“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6页,原书页码,下同);“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尚未触及文字的文化”(31页);“我将毫无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文化称为‘原生口语文化’”(11页)。

旗帜鲜明的“原生口语文化”的最大功绩是克服了书面文化的沙文主义,避免使用非常蹩脚的“口头文献”(oral literature)、“口头文本”(oral text)之类的术语。这样的术语是自我矛盾的:既然是口语,就没有文献,连文本也没有,为什么要把口语和文献连用呢?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滑稽可笑的术语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口语文化,甚至有意识地贬低口语文化。如果认为口语文化是书面文化的派生、变异、衰减和堕落,就把两者的关系本末倒置了。从历史渊源来讲,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不能颠倒过来,何况口语文化还创造了辉煌的史诗、神话和传说。

我们再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明“次生口语文化”:

电子时代又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时代,电话、广播、电视产生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作者自序,3页)

次生口语文化也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的过程是聆听者形成群体的过程……但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比原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大得多,甚至于难以估量——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134页)

广播电视诱发了次生口语文化;其中的遗存性口语和“文字性口语”尚待我们深入研究。(157页)

“次生口语文化”恢复了古代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和电子媒介相比,它的确是次生的、第二位的;此时的口头交谈只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不再占有首要的地位。次生口语文化不是真实的会话,而是虚拟的仿真会话,是一种感觉,一种言语—视觉—声觉构建的公共会话,以电影、广播、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公共会话。

“次生口语文化”这个概念也有很强大的解释力:

(1) 它提醒人们注意高科技时代的口语遗存。在电子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原生口语文化难以生存,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接触到文字,都受到文字的影响。尽管如此,许多文化和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生口语文化的心态,即使在高科技的环境中也存在口语文化的心态。

(2) 既然“次生口语文化”或多或少拥有“原生口语文化”的九大属性,它便能够比较圆满地解释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时代和“重新部落化”的时代。

那么“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有何区别呢?

两者处在不同的文化史分期和媒介史分期:“电子技术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技

术。次生口语文化不像原生口语文化,原生口语文化是文字和印刷术的前身,次生口语文化则是文字和印刷术的产物,且依靠文字和印刷术”(168页)。

两者的心态和意识不同:“口语人的群体心态之所以形成,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到了今天的次生口语文化时代,我们的群体心态则是自觉的,是在按部就班的程序中产生的。今天的人觉得,他们必须要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原生口语文化里的人转向外部世界,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转向内部世界;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转向外部世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向内部世界的转移”(134页)。

为了说明“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区别,翁描绘了两个历史时期美国总统竞选的不同景观,非常生动形象(可参见原书103—104页)。

五 媒介环境学派的泛技术论和泛媒介论

口语是不是技术?是不是媒介?

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主张泛媒介论、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们的文化史观、媒介史观、文明史观经常交叉,他们的媒介分期也大同小异。但在媒介、技术、环境和文化的内涵上,他们却表现出一些小小的分歧。

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多么的宽泛:他在《理解媒介》中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这26种媒介既包括最抽象的口语词,也包括最具象的汽车和武器。

麦克卢汉明确断言口语是技术:“口语是最早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人类用一种新的方法去摆脱环境以便于掌握环境。”^①

读一读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即可以知道,他的媒介观念和传播观念也囊括了一切技术,自然也隐含着语言。

波斯曼在《技术垄断》的第八章“隐形的技术”里,也把语言视为技术。

沃尔特·翁在口语是否是技术的问题上观点比较含糊。他认为口语是“自然而然的”,有别于人为性很显著的物化的技术,所以他说:“和自然的口语相比,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书写方式是不存在的。口语对人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里的每个人必然要学会说话,只要他没有生理或心理上的残障”(81页)。

^①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保罗·莱文森挑战沃尔特·翁在口语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他把技术的起源推回到口语和原始工具出现之前,认为口语出现之前的技术是“前技术”,“前技术”也是环境,也是文化。他说:“按照翁的划分,言语是人的产物,因而具有‘人性’(非技术性),文字是工具生产的,因而是技术。不过这样的区分实质上似乎站不住脚:言语是声带作用于大气产生的;文字可以用手指头在潮湿的沙地上写出来(一般是用手指头操作工具直接写出的);那么,从源头或生产过程来看,这两种活动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诚然,口语出口即逝,文字则不会消逝。然而短暂性也是和‘生命的那一刻捆绑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认为,一切人工制品,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电子生产的和人体器官直接间接生产的人工制品,都是人的延伸,因而都是技术。翁却把言语排除在技术领域之外。”^①

六 沃尔特·翁在媒介环境学派里的地位

为了了解沃尔特·翁在媒介环境学派里的地位,读者不妨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这是《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的第一个选题,是关于媒介环境学派的一本小百科全书。该书的第十二章题名“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定理与媒介环境学”,论述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沃尔特·翁的思想。

沃尔特·翁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是麦克卢汉的弟子和同事,于20世纪50年代成名,在古典学和口语文化研究领域自成一家。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把古典研究、史诗研究、口语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文艺批评嫁接起来,又熔为一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年11月3日

^① [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安东尼·达利 (Antony C. Daly) 和克劳德·帕伍尔 (Claude Pavur) 两位先生审读了这部文稿, 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特此深表谢忱。

承蒙不列颠图书馆应允作者和出版社复制托马斯·埃利奥特勋爵 (Sir Thomas Elyot)《行政官之书》(*The Boke Named the Gouernour*)的封面(正文图 1), 特此致谢。



近年来,人们发现原生口语文化(浑然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里管理知识和口语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深受文字影响的文化迥然有别。这些新发现隐含的意义令人震惊。在文学、哲学和科学里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许多思考和表达的特征,甚至文人墨客口头话语里的许多特征,其实和人类生存的本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特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文字这种技术给人类的意识提供了新鲜的资源。有了文字之后,我们就不得不修正我们对人类身份的理解了。 1

· 本书旨在探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异。本书或其他书籍的读者已经对书面文化有所了解,因为他们置身其中。有鉴于此,本书的首要课题是口语文化里的思想及其表达。不过,这个课题对我们颇为陌生,有时我们甚至觉得有点怪异。本书的第二个课题是书面文化里的思想及其表达,我们将探讨这些思想和表达在书面文化里的兴起以及它们和口语文化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课题不属于任何阐释“学派”。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里是没有任何“学派”的,这里没有任何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恰好对应的“学派”。当然,如果我们意识到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诸如此类的“学派”和“运动”就必然会受到影响。一般地说,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反差和关系的了解,不会产生对理论派别热情洋溢的忠诚,而是促使我们反思人类境遇的方方面面,这些情况难以在此一一列举。本书只能够适度探讨其中的一些侧面,穷尽无遗的论述需要许多卷帙浩繁的著作。 2

用共时法研究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颇为有用,所谓共时法就是对同一时期共存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进行比较。然而,用历时法即历史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也是绝对必需的,这种研究方法要对时

间上前后相继的文化进行比较。人类社会起初是凭借口语形成的,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才出现文字,起初的文字仅见于一些种群之中。智人生存的历史在3万—5万年之间;而最早的文字距今只有6000年。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历时研究,以及对人类进化的历时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框架。借助这个参考框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质朴的口语文化和后继的书面文化,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印刷文化把书面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电子文化则建立在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历时研究框架之内,古与今、荷马与电视就可以互相启发了。

不过这种互相启发的局面来之不易。了解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及其隐含命题,绝非一蹴而就之功,我们不可能立即获得心理演化或现象学的洞见。这样的局面需要广博甚至浩瀚的学识,需要进行殚精竭虑的思考和小心翼翼的表述。其中的问题深奥而复杂,而且触及我们的偏向。我们这些读书人深深沉浸在书面文化里,难以想象一个只存在口语交流和思考的世界,我们倾向于把这样一个口语世界只当作书面文化世界的变异体而已。本书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们的偏向,从而开辟理解这个口语世界的新途径。

3 本书的重点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关系。书面文化始于文字的滥觞,自不待言;稍后涉及印刷术,亦不言自明。所以,本书既讲印刷术也谈文字。此外,本书还要谈一谈运用电子手段的文字处理和思维加工,也就是广播、电视和通讯卫星对语词和思维的加工。我们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了解始于电子时代,而不是电子时代之前。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反差使我们对历史上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的差异更加敏感。电子时代又是“次生口语文化”(second orality)的时代,电话、广播、电视产生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依靠文字和印刷术而生存。

人类社会的变迁从口语文化走向书面文化再走向电子信息处理,这样的变迁必然要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结构的变化。不过,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的变化仅仅是本书间接关注的问题,因为本书论述的重点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不同的“心态”。

迄今为止,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对比研究,几乎只专注于口语文化和拼音文字的比较,而不是口语文化和其他文字(楔形文字、汉字、日文的假名、玛雅象形文字等)的比较;再者,这些研究涉及的拼音文字又仅限于西方使用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也会以东方为家,比如印度、东南亚或韩国就使用拼音文字)。本书的探讨将遵循现有学术研究的路子,当然,在一些相关的地方,我们也会注意拼音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字,注意西方之外的其他一些文化。

沃尔特·翁
于圣路易斯大学